

本文将生理性别、大脑认知风格以及性别角色三者组合构成多维性别变量,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构建出多维性别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机制模型,并利用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性别研究视角下本科生在校学习经历研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双性化是最有利于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性别角色类型,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有利于双性化性别角色形成的结论。

性别平等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创造性思维

■ 杨雪燕 李蕊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高校作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主要阵地,肩负着为国家输送高品质创新人才的责任与使命。大学生作为经历高考选拔的优秀生源,处于学习和发展的黄金时期,理应成为高校的重点培养对象。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创造性思维可被看作创新行为发生的基础。因此,提升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一环,对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性别结构与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作为帮助个体产生新颖独特且有实用性观点或产品的思维形式,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其中,性别作为最简明直观区分组群的人口学变量,已被广泛应用于创造性思维个体差异的研究中。然而,学界在性别对个人创造性思维的影响上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而在我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认知中,普遍认为男性的思维更加活跃,更愿意打破常规;女性则相对更为沉静,会表现得更加乖巧,不会轻易打破规则。但是作为当代青年人的代表,大学生往往思想开阔,敢于尝试新鲜事物,追求自我突破。对于他们而言,创造性思维的性别差异是会遵循我国传统文化的轨迹,还是会因为其群体特征而产生新的变化,仍然需要再验证。

随着社会教育公平意识的增强和妇女地位的崛起,我国女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不断升高。国家统计局2023年4月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高等教育女生占比持续超过半数。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加。2021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生为2780.7万人,比2020年增加124.4万人;占在校生的50.2%。这迫使高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新的学生性别结构,清楚认识到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性别差异,在面对不同性别大学生时能够做到“因材施教”,以针对性的培养方式有效提升大学生创造性思维。

伴随研究的持续深入,性别的内涵被逐渐扩大。性别不只限于生理性别,还包括代表大脑处理信息的一种方式,体现个体思维特征的大脑认知风格,以及围绕社会性别期待产生,体现个体人格特征的性别角色等维度。但在目前有关生理性别、大脑认知风格或性别角色对创造性思维影响的研究中,多数讨论的是三者各自对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影响。鲜有研究将三者结合起来,分别作为性别在生理层面、大脑认知风格层面以及人格层面的三个维度,进而研究不同维度的性别变量对个体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机制;综合考虑大脑认知风格和性别角色具有的“社会性别”属性以及不同维度性别变量对创造性思维作用的相关研究仍不多见。那么,性别的不同维度会对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产生怎样的影响?多维性别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利用2018年西安交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收集的数据展开研究,探索多维度性别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希望能够为提升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与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供思路。

何种性别更有创造性

本研究将生理性别、大脑认知风格以及性别角色三者组合构成多维性别变量,以美国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等人

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构建出多维性别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机制模型,并利用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性别研究视角下本科生在校学习经历研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因社会性别而呈现出显著差异。男生的创造性思维比女生更活跃,但是这一差异在加入了大脑认知风格和性别角色变量之后就消失了,这说明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性别差异是在社会性别的作用下发生的,生理性别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一方面,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男生倾向于将自己塑造成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喜欢接受挑战、对传统和权威更具备强烈的反叛性,以使自身具备社会所认可的成功男性人格特质,这些为男生产生更好的创造性思维表现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刻板印象也总是对男生赋予更多的期望和责任,认为男性更应该和更擅长以新奇而独特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为男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友好的外部环境,最终从整体上使男生的创造性思维表现比女生更活跃。这些都说明,社会性别才是导致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呈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性别差异的根源性因素,而非生理性别。

第二,共情和系统化两种大脑认知风格均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并无优劣之分。这与两种认知风格的本质有关。共情认知风格主要分析他人的情感与感受,对人际交往和日常领域的创造力作用显著。一般而言,女性更擅长于共情认知风格;系统化认知风格主要分析客观事物的结构与系统,对科学发现和建筑领域的创造力有很强影响。一般而言,男性更偏向于系统化认知风格。两种认知风格分别作用于不同领域的创造力,都是形成个人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源泉。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无论偏男性化的认知风格,还是偏女性化的认知风格,都有可能创造性思维方面产生卓越表现。

第三,性别角色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有显著影响,同时可以有效调节大脑认知风格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影响。首先,双性化性别角色的大学生创造性思维最活跃,紧随其后的是男性化性别角色的大学生。其次,双性化的性别角色会放大大脑认知风格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积极作用,即:对双性化性别角色的大学生而言,大脑认知风格对创造性思维的促进作用可以呈现出最优的效果。总而言之,双性化是最有利于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发展的性别角色类型,这一发现也符合双性化人格理论的观点:双性化性别角色的个体能够更灵活、有效地对各种情景做出反应,且独立性强,自信心高。研究也进一步揭示,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有利于双性化性别角色的形成。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针对幼儿阶段的孩子,建议家长应鼓励孩子多样化性别表达,避免在早期过多使用性别刻板印象限制孩子性别角色的多样化发展。

针对接受基础教育的孩子,建议中小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一个有利于个人性别角色多样发展的环境,积极倡导平等友善的性别观念,努力引导学生实现性别角色个性化发展。

针对高等教育当中的大学生们,建议高校营造一个更为平等友好的性别文化氛围,为大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支持大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多样化性别表达和体现多样化人格特质,使双性化性别角色的人格特质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实现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提升。

(杨雪燕为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李蕊为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博士生)

《关怀伦理视域下的中国性别和谐教育研究》

作者:蒋颖荣 阮琦

关怀伦理学主要关注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个体关怀能力的培养、关怀关系的建立及其圈层扩展。本文作者认为,关怀伦理学与中国性别和谐教育的有机结合,能够为消解两性性别差异的异化、缓解中国教育中的性别难题提供一定的学理依据和价值指引。推进中国性别和谐教育应当聚焦于转变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培养受教育者的关怀能力,促进两性之间关怀关系的形成,建立关怀型家庭,进而实现关怀关系的圈层扩展。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阅读提示

当今社会,许多人采取了“职住分离”的生活模式,即生活在一个城市,工作在另一个城市。一边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一边为了陪伴家庭、抚育孩子,于是,一种“新父职”模式渐渐流行:在两座城市间来回奔波的“双城爸爸”。本文作者访谈了20位具有高学历、中产特征的“双城爸爸”,发现双城奔波使得他们和妻子儿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流动的状态,而这种流动状态促使“双城爸爸”们有意识地塑造出“现代慈父”的形象。

■ 高修娟

在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人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许多人采取了“职住分离”的生活模式,即生活在一个城市,工作在另一个城市。相比于母亲,父亲更有可能采取这种“双城”生活模式,这样的父亲群体可以称为“双城爸爸”。“双城爸爸”虽然不能经常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但也不会长久地分离,这使得他们和妻子儿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流动的状态,而这种流动状态促使他们有意识地塑造出“现代慈父”的形象。

笔者访谈了20位具有高学历、中产特征的“双城爸爸”,他们年龄在29~40岁之间,职业为工程师、管理人员等,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往往离开家庭所在的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多则每周回家一次,少则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呈现不断流动的状态。妻子则选择稳定但收入较低的工作,兼顾家庭与工作,有祖辈帮忙照料孩子。这群流动的父亲免除了日常育儿的繁重工作,却有着较高的参与育儿的热情,在离家的时候他们利用工作日的晚上和孩子进行频繁的视频通话,和孩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实现一定程度的远程参与。在周末或者假期回家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密集地参与孩子的生活,实现高质量的陪伴。流动的状态使得这群父亲明确了自己作为育儿辅助者的角色,主动放弃传统的父亲权威,有意识地塑造慈爱平等的父亲形象。

认同“严母慈父”的育儿模式

在传统的育儿观念中,“严父慈母”是理想的父母角色模式,父亲是严格的权威,母亲是慈爱的照料者。现代家庭育儿观念中沿袭了“严慈相济”的育儿观念,却未沿袭“严父慈母”的角色模式。在城市中产家庭中,母亲往往是育儿总管,父亲则总是处于缺席的状态,严格的“虎妈”与慈爱的“猫爸”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角色模式。而在“双城爸爸”的家庭中,这种“严母慈父”的现象更加突出。究其原因,在“双城爸爸”的家庭中,流动的爸爸无法参与到日常育儿事务中,他们只能作为育儿的辅助者,而守巢的妈妈是全权在握的育儿总管,因此这些爸爸主动放弃了传统的父亲权威,转而维护母亲的权威。一位爸爸讲述了自己调整育儿观念的经历:“之前我孩子报那么多学习班这个事儿,是比较有意见的,刚开始的时候还坚持己见,……因为我总不在身边,还是更尊重母亲的意见。”另一位爸爸说:“毕竟孩子大部分时间还是跟妈妈在一起,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她的决定,要不然的话,孩子不听她的话也不好。”育儿必须有家庭权威,流动的父亲明确意识到自己无法承担权威者的角色,因而主动放弃这种权威,转而认同并尊重母亲作为育儿权威的角色。

同时,这些爸爸虽然不能承担育儿的主要角色,但会积极思考育儿问题,根据母亲育儿的情况,有意识地查漏补缺,以便发挥育儿辅助者的角色。在“双城爸爸”的家庭中,妈妈们承担了繁重的育儿工作,因此普遍表现出严格、权威、精细、暴躁的特点,而爸爸们往往就有意识地建构慈爱、放松、耐心、朋友式的慈父形象,以配合妈妈的严格管教,缓解紧张的母子关系。如一位爸爸会在回家时带儿子做一些平时妈妈

不允许做的事情,缓解母亲的严格管控。“……他妈妈平时不喜欢他出去吃东西,我会偷偷跟他去吃东西,或者带他去吃点甜食,……就这些小事。他妈妈平时不让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回家之后带他去做一些。我做这些会让他感觉到家里不会永远都会对他管得这么严。”另一位爸爸则认为妻子“强势”“性格差”,自己就必须更加和蔼有耐心一点:“孩子经常调皮捣蛋了,他妈妈吼他两句也是常有的。我有时候不回来,回来以后不可能说就待在家长待两天,就吼孩子吧。我对他算是比较细心、耐心。他们心里边感觉我稍微和蔼一点。”关于流动与父职的研究表明,迁移会增加父亲的情感表达。这群“双城爸爸”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流动使父亲明确了自己的育儿辅助者的角色,也使得他们对妻子和儿女怀着愧疚的心理,因此他们更加注重情感表达,有意识地以父亲的慈爱补充母亲的严格,以父亲的宽松缓和母子关系的紧张。这也不同于传统的父亲作为家庭育儿的指导者,而母亲是执行者的形象,而是反过来,以母亲为主导者,父亲为补充者。

营造“父慈子孝”的温馨氛围

“双城爸爸”不仅在父母关系中调整自己的角色,也有意识建构新型的父子关系,以便适应流动的家庭关系。和其他流动父亲相比,“双城爸爸”的流动具有独特之处,他们并未和孩子长期分离,而是不断地团聚,又不断地分离,这种流动的父子关系使得他们不像长期在外的父亲一样,与孩子疏远,也不像在家父亲一样具有日常相处模式。

“双城爸爸”经常在周末和假期回到家中,这使得父子相处的时机总是和游玩休闲联系在一起,因此具有轻松愉快的氛围。有关父亲参与的研究表明,有参与意愿的父亲,其增多的育儿时间并未减少其劳动时间,而是将育儿活动纳入休闲时间的结果,因此父亲的参与更多体现在陪玩上。这一点在“双城爸爸”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的育儿时间和休闲时间合二为一,因此他们回家之后的育儿活动主要体现在带孩子去公园、游乐场,陪孩子运动等。“双城爸爸”每一次回家总带着一种小别之后重逢的意味,因此一些爸爸在回家时给孩子带上礼物,带孩子去公园,陪孩子运动等。许多爸爸很自豪地说孩子很想念他,经常盼着他回家。爸爸们通过礼物、陪玩,营造父子之间愉快的相处时光,也使得父亲和孩子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父子联系,这种父子时光,使得父子们不仅感觉到自己尽到了一定的父亲责任,还让父亲享受了亲密的父子之情,这和传统家庭中疏远紧张的父子关系大相径庭。

此外,流动的状态还加速了父亲的去权威化。一位爸爸点明了其中的逻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也在变化,最早就是因为总在一起,我觉得更多的是拿出爸爸或者说长辈对晚辈的这种感觉。我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带入(这种)命令式的安排。但因为现在总也不在身边,这种命令她得接受才行。她一定会按照你的命令去完完全全执行。这时候,我也在有意地消化和理解,更多时候转向朋友式的或者引导式的教育方式。”因此,爸爸们提到父子关系时,不喜欢使用“权威”之类的词语,而是更经常使用“平等”“引导”“朋友”“沟通”等字眼。如一些爸爸所说:“我们都是平等交流”“小孩子不都得顺着他,对吧?引导她顺着自己的走”“我们也没有苛刻的要求,以引导为主,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独特体”。这些例子都表明,“双城爸爸”不再像传统的父亲那样强调父亲权威,而更加尊重儿童,以儿童为中心,塑造平等的、有策略的好父亲的形象。

“双城爸爸”是一群具有特定处境的爸爸群体,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社会父职转型的典型特征,既延续了传统的模式:父亲以经济供养为主,缺席儿童日常生活,也体现了现代转型的特点,如更加平等,更加慈爱等。而流动的处境——经常离家又经常回家的流动状态,尤其促进了他们的情感表达和去权威化的过程,使得他们身上更加体现了“现代慈父”的特点。

(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2020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流动家庭儿童养育中的亲职实践研究”(SK2020ZD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白晨 整理)

《觉醒:中央苏区女性革命形象的构建》

作者:何晴

中央苏区时期,广大女性群体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由此构建的女性革命形象为苏区革命事业顺利展开增添了女性力量。从《红色中华》有关报道来看,积极宣传中央苏区女性革命形象构建过程中以革命动员为手段、阶级划分为抓手、大众语言为准则的特点,对促进中央苏区女性革命形象构建以及妇女解放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新时代妇女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来源:《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三孩政策背景下父职参与类型的质性研究》

作者:方英 许泽钦 李腾佑

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实施及家庭抚育模式的转型,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父亲情感维系与母职密集呼唤父职参与作为平衡母职焦虑的机制,使父亲承担更多家庭抚育工作。本文作者基于21位共同参与婴幼儿照料的父亲或母亲的深度访谈和研究,依照主动性和参与程度,提出父职参与可以划分为充分参与型、辅助配合型、闲暇替补型和日常缺席型四种类型。针对父亲参与育儿的困境,作者从政策、家庭、社区和市场多个主体出发,提出建构多元支持网络,从而支持父亲充分参与深度育儿,增加父职自觉的可能性。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